

中国“东北型”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

胡源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目前, 国内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南边境的跨国婚姻。尽管东南亚女性已经分散嫁到中国各地, 然而学界尚未对特定区域接收外国新娘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聚焦中国东北地区, 在描述东北地区从婚姻移民输出地向接收地转变的同时, 提出“区域文化与移民输出的反哺和反噬”框架, 阐释“东北型”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在此基础上指出, 东亚女性通过婚姻的国际接力的移动实际是“再生产领域的再全球化”, 东亚形成了“结婚的世界体系”。

关键词: 移民; 婚姻移民; 跨国婚姻; 中国东北; 东亚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0) 10-0236-08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移民海外在中国东北地区(以下简称东北)逐渐兴起, 随着经济的滑落,^①东北逐渐成为国际移民输出的活跃地区。^②特别是女性通过结婚移民海外已经不分阶层、不分职业渗透到了一般家庭和个人, 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移民模式。调查数据显示, 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多来自东北。^③

自2009年开始, 笔者一直追踪调查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 在访谈中对她们的原生家庭产生了兴趣, 于是来到她们的老家——东北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 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大量嫁到当地, 这于笔者而言是一个新的发现, 同时也说明东北从婚姻移民输出地转变成了婚姻移民接收地。东北为什么实现了这样的转变? 当地接收外国新娘的拉力机制是什么? 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 本文将“区域”视角引入中国跨国婚姻的讨论。众所周知, 中国疆域辽阔, 地域差异十分显著, 不仅有南北差异, 而且有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和家庭结构不尽相同, 均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因此, 在讨论中国的跨国婚姻时, 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区域中, 在充分考虑地域特性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中国不同地区跨国婚姻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CRK01)。

作者简介: 胡源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 日本神户大学学术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国际移民。

① 乔榛、路兴隆 《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 回顾与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② 王维、钱江 《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南红玉 「外国人花嫁の定住と社会参加」 『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研究年報』 Vol. 59, No. 1, 2010; Chigusa Yamaura, “From Manchukuo to Marriage: Localizing Contemporary Cross-Border Marriages between Japan and Nor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4, No. 3, 2015, pp. 565-588.

的特性,避免看漏全国范围内跨国婚姻的多样性。本文聚焦于东北,从东北的区域特性出发讨论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机制。其次,将东北的跨国婚姻置于东亚视域下进行讨论。鉴于东北的人口移动状况,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不单是移民输出地东南亚各国和接收地中国两者之间的互动,同时受第三方的牵引,如临近东北的日本、韩国等。所以,本文将东北的跨国婚姻放在一个扩大了移民区域链中进行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移民输出地和接收地两者之间,认为正是东北当地居民的海外流动,特别是女性的外嫁直接牵引了东南亚女性向当地的流入。

本文的具体分析脉络如下。首先,对中国国内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进行梳理,提炼出“西南型”跨国婚姻模式,指出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掌握中国跨国婚姻的实际动态,特别是对北方地区出现的跨国婚姻考察不足。其次,从区域文化和海外移民输出带来的影响出发,讨论东北外国新娘的接收机制。最后,提出“东北型”跨国婚姻模式,指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国际接力导致东亚形成了“结婚的世界体系”。

一、中国的跨国婚姻研究

1. 主流的“西南型”跨国婚姻

中国的跨国婚姻研究主要以外国女性来华研究为主,东南亚女性的嫁入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还没有关于来华外国新娘的准确统计,据推测滞留在中国的越南新娘总数超过6.5万人,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越南新娘就有4万人以上。^① 研究者们一方面陈述跨国婚姻的现状,分析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并探索治理策略;^② 另一方面对外国新娘的生存困境^③、生活世界^④、身份认同^⑤等进行讨论。尽管内容涉及多方面,但整体上倾向于将跨国婚姻置于“国家视角”^⑥而不是“国际移民视角”下进行审视,有重“国家”轻“移动”的研究趋势。尤其是关于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的讨论,多通过总结跨国婚姻的特征体现出来,往往使用“社会基础”一词进行描述。^⑦ 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跨国婚姻原因进行了“碎片化”的探讨,不但未能揭示跨国婚姻作为一种人口越境迁移行为的性质,也遮蔽了婚姻缔结过程中除了社会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国际移动的拉力视角,对以往关于中国跨国婚姻接收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出西南地区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并以此为参照展开东北跨国婚姻的讨论。

陶自祥指出,国内的跨国婚姻研究应被置于特定场域进行讨论。^⑧ 陶自祥所谓的特定场域,是指西南边界地区与东南亚各国接壤的广西、云南等地。事实上,目前国内关于跨国婚姻接收机制的讨论,也多聚焦于西南地区。笔者将西南地区跨国婚姻的接收机制总结为地理环境的临近、民族认同、人口学因素三方面。

第一,地理上的临近。如果没有地理上的相邻,其他的社会因素、人口学要素不会发生作用。^⑨

① 李娟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考——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刘中一 《东南亚新娘现状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万蕙 《跨国无证婚姻移民的生存困境及形塑机制——基于粤西7个乡村的调查》,《人口与社会》2016年第4期。

④ 陈讯 《资源互补、婚俗类同与结构性力量保护下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以广西崇左市G村为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⑤ 杨丽云 《跨国婚姻中越南新娘的身份建构——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民村个案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⑥ 覃延佳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⑦ 陶自祥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⑧ 陶自祥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⑨ Gary A. Cretser, Joseph J. Leon, "Intermarriage in the U. S.: An Over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Vol. 5, No. 1, 1982, pp. 3-15.

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在地理上的临近是该区域跨国婚姻成立的基本条件。例如，中国与越南边界线长达1400多公里，其中陆路边界线超过1000公里。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有无数条通道或山间小路连接中越两国，地理上的邻近和边民频繁往来^①增加了跨国婚姻的机会。

第二，民族认同。众所周知，西南地区（广西、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在与东南亚各国相接的地带有许多跨境民族。所谓跨境民族指具有共同的语言、饮食、着装和宗教等文化习惯，但在行政区划上被国界线隔开而成为隶属于两个国家的民族。例如，广西的壮族和越南的岱族、依族。同源的民族和同根的文化构建起了共同的民族认同，这不但促进了边民之间的交往，而且使得边民的国籍观念弱化。^②这种共同的族群文化引发了边境地区跨境民族之间跨国婚姻的盛行。^③

第三，人口学要素。改革开放后，中国边境地区的农村人口有机会离开村庄到发达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特别是许多村落的女孩到广州、江浙等地务工。她们中的大部分不愿再回到故乡，更不愿嫁给当地的男性，这加剧了当地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女性的流出打破了村落原有的婚姻市场的稳定性，使得当地男性需要在全国的婚姻市场中以更多的资源获得女性的青睐。但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给该地区农村男性带来很大的婚姻挤压。由于传宗接代和家庭延续依然是核心的家庭价值观，男性只能通过区域优势到相邻异国寻求女性资源。^④此外，重男轻女的传统及“溺婴”陋习^⑤使西南边境地区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2000年以来广西性别比一直超过112，名列全国前三位。男性多于女性是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盛行的主要原因。^⑥

除了以上所述，西南边境与邻国的经济差距^⑦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⑧也是西南地区跨国婚姻成立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在以上拉力作用下产生的跨国婚姻称为“西南型”跨国婚姻。

2. 东北跨国婚姻研究的缺失

目前，湖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经常看到越南妻子的身影^⑨尤其是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外国新娘。东南亚女性嫁到中国的地区已经不局限于西南边境，她们与中国男性的通婚圈逐渐扩大，伸展到了内陆的汉族男性^⑩这种婚姻不仅跨越国境而且跨越族群。近年，尽管学界出现了一些关于跨境跨族婚姻的分析，但研究基础依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关于跨境跨族婚姻在各地的成立机制研究非常少。在极少数的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强调婚姻中介的作用。例如越南女性嫁到福建省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的中介发挥着重大作用。^⑪在决定结婚移民的阶段，越南方面的社会关系比中国方面的社会关系重要，家庭与亲属的精神支持及婚姻中介的斡旋都是促成跨国婚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移民中介对于跨国结婚的发生作用显著。^⑫在这些研究中，虽然指出了中介在跨国婚姻缔结中的存在及作用，但并没有综合探讨各地区接收跨国新娘的机制。

此外，这些研究的调查多在湖北、福建等省份展开，即涉及的区域有限，没有全面把握中国跨国

① 欧海艳 《21世纪以来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南方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陆海发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 罗文青 《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的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④ 陶自祥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

⑤ 刘计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述评》，《西北人口》2011年第6期。

⑥ 梁茂春、陈文 《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南方人口》2011年第4期。

⑦ 陆海发 《边境治理中的跨国婚姻移民：特征、动力及其影响——基于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调查与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⑧ 赵静、杨梦平 《中缅边境地区边民日常交往与跨国婚姻的形成》，《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6期。

⑨ 郑进 《脱嵌与悬浮：越南媳妇的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困境——以鄂东北四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⑩ 王晓燕 《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中缅边境少数民族通婚圈的变迁》，《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

⑪ 武艳华、陈海萍 《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人口与社会》2017年第3期；张艳霞、吴宜超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⑫ 武艳华、王毅杰 《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的跨国迁移——基于福建永春的田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婚姻的实际动态，特别是忽略了北方地区的跨国婚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6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居民与越南妇女跨国婚姻登记共计719件。2009年9月前，哈尔滨市居民与越南妇女跨国婚姻登记为3件，第四季度即达到41件；到2010年10月左右达到高峰，当年中越婚姻登记总数就达577件。^① 尽管东北早在2009年就已经出现了越南新娘，但很少有学者关注东北的跨国婚姻。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北比湖北、福建等地距东南亚更远，自然环境也与东南亚迥异，为什么东南亚的女性会远嫁东北？东北在怎样的拉力作用下成为了外国新娘的接收地？

二、调查概要

F县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186公里，人口约23万，其中汉族占97%，朝鲜族占1.9%，还有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居民。该县管辖4个镇4个乡，共67个行政村，258个自然屯。^② 该地在抗日战争时是日本军民的集结地之一。据统计，现定居在日本的东北遗孤和妇女大约有10万人，其中3.8万人来自F县。^③ 特殊的历史因素促使当地居民大量移民日本，特别是女性大量流出。2011年，200名以上F县女性嫁往日本，占当年F县结婚数量的10%。^④ 与此同时，外国女性不断嫁入当地。从2010年初开始，就能看到F县及周边地区男性迎娶越南新娘，到当年7月末大约有300—400名越南新娘嫁到当地。^⑤

笔者通过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的介绍，于2015—2018年先后3次到F县及其管辖的2个镇进行了调查，每次调查时间3周—4周。访谈范围包括女儿外嫁日本家庭的父母、当地居民、接收越南新娘的家庭、当地的移民中介、日语学校等。共访谈了26个迎娶越南新娘的家庭、32位居民、3所婚姻中介的工作人员、1所日语学校的工作人员。笔者主要针对当地移民到日本和韩国等的整体情况、人口结构、居民意识、婚姻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数据收集，特别是对女性的外嫁给当地婚姻市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访谈，涉及结婚成本、居民对移民女性的态度等。

三、东北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区域文化、移民输出的反哺和反噬

1. 区域文化：宽容的婚姻观

东北原是满族聚居地，在移民迁入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从清代开始，关内的广大汉族移民与俄国、日本、朝鲜等国际移民逐渐进入东北，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移民社会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到咸丰十年（1644—1861年），第二阶段从咸丰十年到日本投降（1816—1945年）。清末东北人口除了原有居民和自然增长外，由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移入的人口大致有1000万。中华民国建立后，华北人民移居东北的势头有增无减。^⑥ 1908—1930年，东北人口大约增加了72%，其中48%是移民。^⑦ 1933—1940年，东北人口

① 徐文洲《越南“新娘”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F县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统计年鉴》，2012年。

③ 蘭信三「満洲に生きた日本人を知るための三冊」『アジア遊学』Vol. 150、2012。

④ 林子敬《中国新娘在日本：有人日语很好 基本不和中国人来往》，《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

⑤ 单士兵《中国男人到底为何偏爱“越南新娘”》，海外网，http://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13/1227/content_20087998_1.html。

⑥ 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⑦ 满史会编著：（日）《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转引自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增加了1200万人,其中86%是移民。在政府、社会、民间团体的多重作用下,东北容纳了大量移民。^①

随着移民的迁入和定居,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口混居,各种文化经过冲突、融合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等特征的东北文化。^②在家庭文化方面,由于移民最初是以个人或核心家庭的方式而非整个家族方式进行迁移,使东北的血缘关系和家族势力比中原地区要薄弱得多。这种社会结构特点使东北人的家族、血缘观念比较淡薄,受传统束缚较轻,热情坦率并易于接受新事物。这些特征反映在婚姻观上,则表现为婚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私人感情问题,受到外力干涉相对较少,对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之间的通婚有着很高的社会接受度。离婚同样也被视为个人的事情,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与压力较小。^③在中国的离婚率统计中,东北地区一直高居全国首位。很多学者指出这与东北的移民文化有深刻的关联。^④东北相对开放的婚姻文化赋予了个人很大的婚姻裁量权,这对当地接收外国新娘有一定的助力作用。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对迎娶外国女性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反而能够给予理解。

2. 移民输出的反哺:对婚姻移民的“认知”

1972年中日邦交的恢复,推动了在东北的战时遗孤和妇女回日本寻亲的归国潮。1989年日本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接收战争遗孤的范围。蘭与高野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东北战争遗孤回国不仅是因为怀念家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日本寻求更好的经济和教育机会。被从中国邀请回日本的除了战争遗孤本人之外,还有其“家庭成员”。^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北和日本间建立起了复杂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具有两种功能,第一,信息功能,向东北传达了日本社会的信息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信息,让当地居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产生出了只要移民日本就会致富的幻想,煽动了当地人的移民欲望。第二,工具功能,为想要移民的东北亲戚和朋友提供了无偿或有偿的移民手段,致使大量东北居民移民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崛起,东北的朝鲜族居民开始移民韩国。随着信息回流及移民网络的发展,移民范围逐渐扩展到当地一般居民。

在族群文化、地缘位置、历史渊源、移民网络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东北居民早早就对越境移民有了认识,尤其是了解通过商业网络移民海外的路径,甚至对中介费用的市场行情都有动态的把握。

村里很早就有人去日本和韩国的,现在嫁过来了越南媳妇,我们不觉得奇怪。村里的女人都嫁到国外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娶外国媳妇。(村民C)

早些年都去日本和韩国了,现在也有去的,出去以后都往家里寄钱。她们(越南女性)和中国女(性)的出去(海外)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和家里来的。(村民A)

通过上述访谈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对于越境移民,特别是对女性通过婚姻中介实现越境移动没有排斥或者不接受,对嫁入当地的外国新娘并没有感到过多的意外和陌生。不但如此,居民把外国女性的嫁入与中国女性的外嫁看作同种性质的行为。笔者认为,当地对外国新娘开放的态度是东北作为移民输出地被“反哺”的一种表现。所谓“反哺”,指长久以来东北向海外输出移民的过程中沉淀下了一种公共的“认知”。这种“认知”包括对跨国移动行为本身的知晓、对移民途径的耳闻、对移民动机的理解。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当地居民对婚姻移民有了知晓,同时也认识到他们也可以在

① 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② 李雨潼、杨竹《东北地区离婚率特征分析及原因思考》,《人口学刊》2011年第3期。

③ 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徐安琪、叶文振《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李雨潼《东北地区离婚率全国居首的原因分析》,《人口学刊》2018年第5期。

⑤ 蘭信三、高野和良「地域社会のなかの中国帰国者」蘭信三編「中国残留日本人という経験 「満州」と日本を問い続ける」東京:勉誠出版、2009、316-352頁。

国际婚姻市场上寻找结婚对象。不但如此,对到来的外国新娘能够持包容的态度,甚至能够透视她们嫁到当地的动机。总之,在常年的移民输出过程中,在当地建立起来的公共“认知”潜移默化地助力了对外国新娘的接收。

3. 性别化移民输出的反噬

东北女性结婚移民海外已成为当地的一种“常态”,这种性别化的人口外迁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性别结构和婚姻文化,同时引发了当地居民对中国女性的再评价。本文将这一系列变化称为“性别化移民输出的反噬”,这种反噬也是拉动东南亚女性流入东北的力量之一。

(1) 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 男多女少的困境

女性婚姻移民不同于家庭移民或劳动移民,她们不是家庭式迁移,也不是移出一段时间后再环流回出生地。对于移民输出地而言,婚姻移民是人口净流出,而且是永久性的流出。与家庭移民和劳动移民相比,婚姻移民对输出地的意义完全不同,其给输出地带来的不仅是性别权利关系的调整或重组,^①更主要的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婚姻市场变动。笔者在 F 县 D 村调查时发现,当地 20—35 岁的女性大多结婚移民去了日本和韩国。

村里的姑娘都嫁到国外去了,一个带一个,有的是互相介绍,有的是自己找门路(一般为商业中介)。别说没结婚的姑娘了,就是结过婚离过婚的女人也出去,就剩下年轻的小伙了。现在很不好找对象,家里条件若是好点还能好找些,如果家里条件不好,那可就难了。村里离过婚的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才找外国的,都是没有办法了。(村民 L)

在 F 县,嫁到海外的女性的年龄层跨度非常大,并非只限于年轻女性,亦有中年的再婚女性。一些村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村里“女性不足”“男性结婚难”问题突出,甚至出现了“光棍村”。在 F 县城里和周边村庄,无论是适婚期的初婚男性还是有离婚经历需要再婚的男性都面临着结婚压力。在当地甚至出现了初婚男性与再婚女性的婚配组合。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与家庭文化下,有婚史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并不具有竞争优势,然而在性别失衡的 F 县,这种与中国传统相悖的婚配模式已悄然出现。而且据当地居民的介绍,即使是二婚女性彩礼也依然高昂,她们在婚姻市场上依然具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丝毫没有因为曾经的婚史而影响在婚姻市场上的交涉力。调查发现,在 F 县二婚女性的彩礼也需 10 万元左右。这种与传统婚配模式相悖的现状正是当地性别化人口外移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的写照。不协调的人口结构为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创造了空间。

(2) 男性的双重压迫: 结婚成本的高昂与性别文化的调转

在中国,“嫁娶婚”仍然是主要的结婚形式。在婚姻缔结的谈判过程中,一般是女方提出聘礼要求,对男方来说这是硬性要求。与聘礼相比,女方的嫁妆不是硬性要求。男方不仅要支付聘礼,还要建新房,与男方相比女方的婚姻支出要少得多。^②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父母对孩子的抚养始于生、终于婚,等到所有的孩子结婚以后,才算是完成了作父母的责任。^③也就是说,中国结婚费用的负担者不是结婚者本人,而是其父母。所以一个未婚男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指其本人的经济状况,而是指其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能否结婚或者能迎娶怎样的女性,多由父母的经济能力决定。在东北农村,农业是支柱产业,拥有的土地规模是衡量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在当地的婚姻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反之,则不具备强有力的交涉力,甚至受到排挤。

在 F 县,楼房、汽车、土地是结婚的必备品,男性的彩礼成本一般在 20 万—30 万元,然而当地农户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3 万—5 万元。在调查的 26 个家庭中,有 23 个家庭的父母坦言无法承担儿子

^① Danièle Bélanger, Tran Giang Linh, “The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n Gender and Marriage in Sending Communities of Vietnam,” *Current Sociology*, Vol. 59, No. 1, 2011, pp. 59–77.

^② 桂华、余练 《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③ 李飞龙 《变革抑或延续: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关系(1949—1978)》,《农业考古》2012 年第 6 期。

的结婚费用，高额的结婚费用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在当地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此高昂的结婚成本与当地女性的稀缺有直接关联。人口结构的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彩礼的商讨中决定权完全由女方掌握，而且要价高昂。经济处于底层的男性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迎娶外国女性。据婚姻中介的工作人员介绍，F县迎娶外国女性的成本大约在5万左右（包括去国外的旅费和中介费），远远低于迎娶中国女性的成本。

除了高昂的结婚成本之外，在男多女少的环境中，社会性别因素也格外凸出。笔者发现，一部分经济条件尚可的男性因超过了当地的适婚年龄而得不到中国女性的青睐。在F县，迎娶外国新娘的男性多集中在27—35岁，与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周岁）相比，他们是“高龄”群体。不仅结婚年龄被挑剔，一位女性在诉说侄子的婚姻时提到了以下情况。

我的侄子在日本工作了3年，攒了一些钱。正是因为在外工作了3年，年龄稍微有点大，在这就不太好找媳妇。侄子脸上有些青春痘，当地的女孩就因为这个看不上他。现在就是女孩子少了，男孩子很不好找对象。如果是在以前，哪有对男孩子的相貌这般挑剔的。只要男孩经济好，哪会在乎脸上长不长痘。（访谈者M）

调查发现，在F县除了传统的经济条件要求之外，年龄、婚史、容貌这些原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父权制束缚，调转了方向指向了男性。在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上，男性面临着双重的不利。

（3）对中国女性的再评价：女性信用危机的招致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里，离婚对女性而言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但在F县笔者却发现了相反的现象。离婚不但不会令女性恐慌，反而出现了女性自己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

现在的媳妇，在家里一点委屈受不得，如果有一点不满意她可能就提出说要离婚。媳妇在家里厉害得很，现在家里都是媳妇说了算。我们家原来的（中国）媳妇的娘家亲戚先出去（去国外）了，回来说在国外三个月挣的钱比家里一年的收入都多，媳妇慢慢得就开始嫌家里穷，然后就离（婚）了，孩子（孙女）一直是我跟孩子奶奶看着。村里有很多女人离婚走的（去国外），现在中国的女人照样不可靠，说离婚就离婚，还不如外国媳妇。（访谈者Q）

随着中国女性远嫁海外的增多，特别是离婚女人的成功外嫁，在当地流传着女性即使离婚带着孩子也可以在国外找到伴侣的消息。这些被散布出来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女性的婚姻意识。如果夫家经济条件差或者与公婆关系不融洽，她们不会像以前的女性为了家庭和孩子而忍耐，而是自己提出离婚，并很快付诸行动。

在中国，孩子的存在是婚姻能否维持的重要条件^①，孩子是阻止离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F县调查发现，对当地的女性而言，移民海外是可以与孩子相匹敌的事情。在访谈的家庭中，很多都是有孩子的母亲为了移民而置孩子于不顾毅然选择离婚。当地居民对未婚女性的移民行为持赞同或中立态度，认为这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是对为了移民而抛弃孩子离婚的女性，人们一致表示反对。

然而这样的女性却络绎不绝，长此以往居民逐渐对中国女性的婚姻忠诚度提出质疑，认为她们的家庭责任感极低，对她们的不信任也油然而生。这种对中国女性的不信任给外国新娘的嫁入提供了机会。由于有外国新娘离家出走的先例，当地居民普遍认为迎娶外国媳妇存在风险，但在中国女性不顾一切远嫁海外的现实面前，居民同样也深刻意识到，即使是中国女性也有被离婚的风险。既然同样都存在风险，他们也愿意尝试迎娶外国女性。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东北的经济状况也是居民将视线转向国际婚姻市场的原因之一。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处在全国后五位，到2017年东北经济规模占全国的比重降至

^① 尚会鹏、何祥武 《乡村社会离婚现象分析——以西村为例》，《青年研究》2000年第12期。

6.7%。^① Danièle Bélanger 和 Guillaume Haemmerli 曾到嫁到海外的越南女性的家乡进行调查,发现当地的结婚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当地内婚变成了从较远省份迎娶新娘,以补充当地女性远嫁海外带来的新娘不足。^② 鉴于东北的经济状况,当地的男性通过区域优势吸引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嫁入似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迎娶国外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女性。

四、“东北型”跨国婚姻与东亚“结婚的世界体系”

东北宽容的婚姻观及移民输出带来的反哺与反噬成就了当地的跨国婚姻。东北跨国婚姻的拉力机制与西南完全不同,尽管同样涉及了人口学要素和区域文化因素,但具体情况不同。从人口学要素来看,东北的性别结构失衡来自于当地居民的海外移民,特别是女性通过结婚移民海外而不是女性的国内流动。从区域文化来看,西南是共通的族群文化引发了民族认同,东北却是在移民混居的土地上衍生出了包容的婚姻文化。此外,东北常年作为海外移民的输出地,在此基础上沉淀出的对婚姻移民的公共“认知”,以及性别化移民输出引发的对当地女性的信任危机,给当地外国新娘的接收提供了机会,这些是“西南型”跨国婚姻所没有的。总之,东北外国新娘的接收是基于当地独有的区域特征产生的社会现象,本文将之称为“东北型”跨国婚姻。

目前,中国很多省份出现了跨境跨族群婚姻,但鉴于各地的文化和人口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可以推定其接收机制断然不一致,所以本文提出将“区域”视角引入中国跨国婚姻的讨论,以展现各地机制的特性和中国跨国婚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中国境内来看,东北从婚姻移民输出地转变成了婚姻移民接收地。但从东亚来看,东北是一个缩影,一个向世界输出移民而导致输出地人口资源干涸的缩影。一直以来,女性作为再生产领域的担当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即“再生产领域的全球化”被热议。^③ 本文认为,东北跨国婚姻的接收意味着在东亚开启了新一轮的婚姻移民,这实际是再生产领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轮资源调配之后又开始了第二轮资源调配,即“再生产领域的再全球化”。

在东亚,这种区域范围内妻子供给宛如一场接力赛,接力赛的第一棒由韩国和日本递出,接棒国是中国;第二棒由中国递出,接棒国是东南亚各国。在东亚的女性婚姻移民的国际接力赛中,接力棒传递的方向性俨然是世界体系的再现,即从“中心”到“半中心”再到“边缘”,笔者将这种移动秩序称为“结婚的世界体系”。现在手握第三棒的东南亚各国,今后是否会把接力棒递出,或者说递交到哪里?是继续按世界体系纵向递交下去还是产生其他顺序的交接,譬如横向平行的交接,是需要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问题。今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和地区的人口变化以及区域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女性的跨国婚姻接力”和“结婚的世界体系”在局部发生序列变动或重组,东亚国际结婚市场的动向值得进一步追踪。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序列化的国际结婚体系中处于最后接棒国底层的男性,他们不仅被边缘于本国国内的婚姻市场,同时也被挤到国际婚姻市场的最底端,双层的边缘极可能导致他们永久地丧失结婚机会,他们的婚姻问题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责任编辑:王永平

^① 乔榛、路兴隆《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② Danièle Bélanger, Guillaume Haemmerli “‘We no Longer Fear Brides from Afar’: Marriage Markets and Gendered Mobilities in Rural Vietna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28, No. 3, 2019, pp. 245 - 270.

^③ 落合惠美子「日本への外国人流入からみた国際移動の女性化」石川義孝編著『人口減少と地域』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9、292-320頁。